◆观 点

重要的是恢复社会生态

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实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矛盾不可忽视，这就是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和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同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作为政府只能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当作目标，决不能把满足人们的无限贪欲作为目标，从而不断吊高人们的胃口，无节制地增大欲望。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谁占有稀缺资源，谁就能掌控社会。奴隶社会，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奴隶主拥有奴隶，他就掌控社会；封建社会，粮食是稀缺资源，地主掌控土地生产粮食，他就掌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厂房是稀缺资源，资本家拥有机器厂房，他就掌控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碧水蓝天好空气是稀缺资源，谁掌控这个，注定会主宰未来社会的发展。

保住碧水蓝天好环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当下社会不同程度地显现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社会秩序失谐的状态，很多人是物欲横流、贪欲无度。由此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互伤链”。你在我鸭蛋里加苏丹红，我在你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给我造劣质电缆，我给你造以竹片代钢筋的预制水泥构件。在这个相互伤害的过程中，伤害人者挣到了钱，但社会道德被掏空了，良心被掏空了，不光中国企业如此，洋快餐同样被卷入其中。近五年来，洋快餐已曝出17起安全事件。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乱象：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漠、价值观混乱、潜规则盛行，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更可怕的是破坏了社会生态。人们把虚构当历史，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社会生态一旦遭到破坏，比自然生态恢复起来更难。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于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有难一定同当。我们一起头顶这个“生态灾难”，必须齐心协力克服这个“灾难”。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和生态两个规律，首先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错误理念，充分认识“人类只是自然中的一员”，人类与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严守先人古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次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克服“重增长、轻发展”“高消耗、高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的偏激理念，不能与子孙争饭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再次应树立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观，是科学技术赋予了工业文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必须把生态学原理植入现代科学技术，规避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最后应树立“绿色消费至上”的科学消费观。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在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行为上做到合理适度，切忌盲目攀比、奢侈无度。也不要只指责别人破坏环境，可以说在环境变坏这个问题上人人都是罪犯。每个人都在为破坏环境推波助澜，只不过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应打造一种品质，前面99个人都闯红灯，我是第100个过路的，我决不随大流去闯这个红灯。我们面临种种危险，但我们看不见带来危险的敌人，其实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环境的恶化是自己破坏的。

总之，保住碧水蓝天好环境，就要把扭曲的社会生态扭转过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当成至高无上的原则，真正落实生态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2014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刘奇）

云计算需突破重重挑战

在当今的互联网领域，云计算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虽然我国云计算产业发展迅猛，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是信任体系尚未建立。用户在选择云服务商时，首要考虑的三个因素为稳定性、安全性和网络质量。目前，亚马逊、谷歌、微软等云服务的企业用户数均已达10万量级。而我国因为目前尚未建立起以法律监管为指导，以云服务安全、服务质量等相关技术和标准为基础、以评测认证为主要方法的信任体系，用户在选择云服务时还有不少顾虑。

二是云计算在特定行业领域的应用和推广面临障碍。过去某个企业要搭建企业IT系统，需要建设数据中心、购买大量软硬件设备，我国这种以建设投资为主的IT建设模式，阻碍了云服务在特定行业领域（教育、旅游、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同时，云计算服务所必需的标准规范、合同范本、后期管理等配套机制尚未建立也限制了云计算的发展。

三是云服务将过去静态的固定资产投入转化为动态的信息服务采购，这与政府传统的预算和审计制度不相适应。按什么目录采购、采购什么、预算怎么做等问题，使得政府不能用；云服务管理细则的缺失，使得采购面临厂家锁定、安全管控等风险，使得政府不敢用；而云服务给现有运营模式和利益团队带来的冲击，使得政府不愿用。

未来，我国云计算产业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突破。

一是建立能对云服务的可用性、安全性、数据保护、可迁移性等方面进行权威评估认证的第三方组织，并鼓励企业开展符合标准的可信云建设，增强用户信心。

二是发展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体系。一方面通过科技专项等政府资助帮助企业建立自主技术体系，形成可重复使用的核心产品，并在各行业领域进行产业化应用，带动全局发展。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积极加入和开展开源社区活动，增强在开源社区中的影响力，并利用开源等方式形成优势企业的技术溢出，带动整体技术进步。

三是突破机制瓶颈。推动云计算在特定行业领域的应用。根据云服务的特点，优化现有云服务的采购预算、管理、审计等制度，建立采购云服务的审查机制，确保应用安全，在此基础上，推动云计算在政务、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

云计算构建的低成本和泛在、智能、便捷的信息服务体系，是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它塑造的信息资源优势将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它还将扩大信息消费市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助力新兴产业崛起。当前，世界各国在以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更需认清我国云计算技术的优势和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制度建设和改革力度，不断促进我国云计算的发展。（2014年第10期《时事报告》李洁）

◆纵 横

制度的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拉贾斯坦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活动。当地政府制定了一项制度：每栽一棵树，奖励13卢比。这项奖励制度激励很多农民抱起树苗，拿起锹镐，见缝插针地植树，在申报得到当地政府认可后，就可以领到奖金了。

然而，政府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植树的成活率很低，普遍不到60%，有的甚至不到37%。原因很简单：农民为了多捞钱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极少浇水、施肥，没有到位的后期管理，被牲畜糟蹋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为了提高植树质量，政府派一些官员到各地监督，但成活率还是没有得到大的提高。因为，有官员现场监督时，农民栽树就认真些；官员一走，那些偷工减料的人又照旧敷衍了事。为了提高植树质量，政府还对农民进行集中培训，教育他们要理解植树造林的意义，以大局为重，不能见利忘义。但是成活率依然没有多少提高。

后来，政府修改了原来的奖励制度：将栽一棵树奖励13卢比，改为活一棵树奖励13卢比。这就是说，不管你今年栽了多少棵树，均以下一年的存活数来支付奖金。

从此以后，农民不但保质保量地植树，而且后期管理也跟上了，及时地给树浇水、施肥，牲畜糟蹋树苗的现象几乎没有了。结果，植树的成活率直线上升。

一个类似的案例发生在更早的时候。

17至18世纪，英国政府将犯人海运到澳洲，起初是按犯人上船时的人数向私营船主付钱。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见利忘义，压缩开支，甚至不顾犯人的死活。他们最大限度地增加每条船运送的犯人数量，使船上犯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同时还大量地克扣犯人的食物，使很多犯人在途中患病和死去。更残忍的是，有的船主竟然把患病的和不顺从的犯人扔进大海。

于是，英国政府开始研究解决如何降低犯人死亡率的问题。如果加强医疗措施，给犯人多发食物，增加营养，势必会加大运输成本，同时依然无法控制船主恶性膨胀的私欲。如果在船上增派监管人员，必将增加政府的开支，同时也难以保证监管人员在暴利的诱惑下不与船主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最后，英国政府修改了原来的规定：由按犯人上船时的人数向私营船主付钱，改为按犯人活着到达澳洲的人数向私营船主付钱。

从此以后，私营船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保证犯人活着到达澳洲。英国政府只是改变了付费制度，并没有多花一分钱，结果运往澳洲犯人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最低时只有1%，而此前最高时竟达94%。

在很多情况下，制度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好的制度可以促使管理效果大幅提升。（2014年第10期《决策》光宇）

◆史海钩沉

甲午战争里的“海归”对决

2006年，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马幼垣在《九州学林》发表专题论文《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之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才日益暴露出来——虽然同样被称为“海归”，但北洋舰队中的留洋军官与他们的日本同行所受培训的程度大有不同，登舰实习的时长与收获也良莠不齐。然而托庇于乡谊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这批年轻留学生归国不到十年就已升任最新型军舰的管带，且长期未再有调动，进取心、学习精神和意志力遂江河日下，被清廷视为“奇货”的中国海归却在甲午一战而亡，留下的只有慨叹和教训。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海归”之间的对决。

日本“海归”反复磨砺

若以开始接触蒸汽舰船、培养现代海军人才的起点论，日本比中国约早十年；1860年代后期，幕府和萨摩藩即已派员数十人赴英、荷等国学习舰船驾驶和造船技术。不过中日两国着手建立系统的海军教育制度，大致仍始于同一时期：1867年初，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正式开班；三年后，幕府末期停办的海军兵学寮也在筑地恢复。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军留学生起程赴英；1877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英海军留学生也乘“济安”轮启航，人数同样为12名。这两批“海归”后同于1878年返国，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见，实为惊人的巧合。

若以出国前的履历论，日本的12人年纪虽不大，但几乎都拥有在蒸汽舰船上的服役甚至实战经验，有的还是中级军官。但英国方面一来对日本的示好尚不重视，二来认为这批留学生此前并未接受完整的初级军官教育，拒绝批准其入读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BRNC）。这样一来，大部分留学生只能改考民间商船学校，或进入海军造船厂和军工企业充当高级学徒（当时英国仅特许少数日本贵族子弟报考正规大学）。如东乡平八郎便是在投考达特茅斯不遂，于1872年入读格林海斯的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佐双佐仲、原田宗介等人则先后在朴茨茅斯、米德尔斯堡、赫尔的海军船坞和兵工厂见习，经历颇为曲折，还须忍受经费不足的窘况。

东乡平八郎的经历可谓早期日本留学生的缩影。其实首批12位日本留学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国海军“开恩”，得以就读格林尼治学院；余者无不如东乡一般，需要在民间海校、海军基地和工厂自行寻找学习机会，承受头脑、意志力、财力（官费发放常不及时）和健康的四重考验。有6位学生就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无声无息地被淘汰了，1878年学成归国的仅有另外6人。

衣锦荣归远非终点，而是另一段考验的开始。东乡随“比睿”舰归国之际，不过获颁中尉军衔；在先后担任过两艘木壳炮舰的副长之后，才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第二丁卯”号的舰长。1884——1890年，他先后担任过三艘炮舰的舰长，监督过一艘炮舰的舾装工作和横须贺镇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巡航，这才升至大佐军衔。1891年底东乡担任吴镇守府参谋长满半年后，受命接掌防护巡洋舰“浪速”号，任该舰舰长直至甲午海战爆发。

简言之，即使第一批“海归”在求学时的淘汰率已高达50%，日本海军也并未因物以稀为贵，就对他们的晋升予以优待。东乡虽然既具备实战经验，又有难得的环球远航历练和督造大舰的履历，但仍然要从小炮艇的副长做起，积累指挥各种中小舰艇的经验，并承担一阶段行政和参谋工作；直到军务部门确认其能力足以胜任主力舰舰长，才会放心地将最现代化的军舰交给他。至于军衔晋升，虽然要综合个人贡献和资历，但在授予将军衔时仍严格以军功为准绳，绝少通融，并不因“人才难得”就降低标准。

实际上，前几批日本海军留学生的淘汰率之高，可谓触目惊心：1871年派赴美国的4人中，仅有在华盛顿游学的坪井航三（赴美之前已经是海军主力舰“甲铁舰”的副长）日后升至将官，其余三人皆默默以终。1878年随德国军舰“维涅塔”号前往欧洲远航的第一批8名留德见习生中，只有走上层路线的山本权兵卫后来官居显赫。从1867年到1887年，日本外派的海军留学生计有留英25人、留美21人、留法6人、留德1人；在外国舰艇上短期实习的有英舰5人、美舰3人、德舰8人，绝对数量并不多。而在总数不到70人的“海归”里，甲午战前已升至舰长以上的不过坪井航三、东乡平八郎、伊地知弘一3人而已。

中国“海归”温室困境

当东乡平八郎前往伦敦督造“扶桑”舰之时，12名中国留学生也于1877年5月抵达英国，开始求学之旅。严格说来，他们并非晚清海军中的第一批“海归”：1872——1881年短暂的留美幼童项目中，詹天佑、吴应科等人归国后即服务于海军，甲午战争时的“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福龙”鱼雷艇管带蔡廷幹均为留美幼童出身。但幼童在美期间所学的毕竟不是海军专业，1877年赴欧的这批学员则已经历船政学堂的近十年教育，所欲求取的也是海军驾驶、制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修。赴英的12人中除萨镇冰外，皆出身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即中国首批按现代模式培养的海军军官。

船政第一期学员于1867年初开班，至1871年结束理论学习，转登风帆练习舰进行为期两年的远航训练（在南海和华北沿海）。1874年以后，这批毕业生已经开始在“建威”“扬武”训练舰上担任教习。出于对他们科班履历的信任，英方不仅没有像非难日本学员一般要求中国学生从头“回炉”，还慷慨地给予了他们报考格林尼治海军学院（ORNC）的机会——这所成立于1873年的新学校是皇家海军为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而设，相当于海军研究生院；尽管英国在传统上更重视航海实践，但提议中国学员报考格林威治，意味着已经承认对方是合格的初级军官。然而奇怪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船政第一期成绩最好的3位毕业生刘步蟾、林泰曾和蒋超英似乎完全意识不到机会来之不易，拒绝参加考试，申请直接上舰见习；其余9人参加了考试，有3人落榜，严宗光（严复）、方伯谦、林永升等6人则顺利入读1877年10月开学的驾驶班，但真正在格林威治校园的时间不过8个月而已。

尽管长期以来顶着“海归”头衔，但12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6人接受了学院深造，还是大大缩水的进修课；另外6人则不过经历了一场升级版实习而已。当然，所有12人的海上实习都是在英国海军现役舰艇上完成的，比起乘商船环球航行的东乡自是莫大的幸运，但中国学员对这种机会的重视程度依旧令人怀疑。刘步蟾等人在英舰实习的状况，既无报告详述，又无专业人士评估，成效殊可担忧。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际，9艘铁甲舰和巡洋舰里有7艘由“海归”舰长指挥，而其中海上经验最丰富的第一期留英学生，归国也不过仅仅9年而已。

更令人扼腕的是，“海归”舰长们非但没有将英国海军的传统与榜样带回到中国，反而因为早早身居高位，形成一个利益圈子。1888年以后，闽籍“海归”管带的自甘堕落和地域主义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不仅排斥邓世昌这样的非闽籍、非留英系军官（哪怕邓氏也是船政后学堂出身），甚至以刘步蟾为首，对抗要求整肃军纪的英籍总督察琅威理上校（William Metcalfe Lang）。1890年，琅威理与刘步蟾发生冲突后离舰，英国海军大感不满，宣布暂停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到这时为止，已有35名中国军人自英国学成归来，另有34人曾在法国留学，与日本留洋海军人员总数完全一致。而这些中国“海归”唯一值得夸耀的经历，或许是他们晋升到将军级的比例远比日本人高——即使是何心川这样被张之洞公开上奏呵斥、称为“旷废岁月，耽误水师人才”的庸人（何氏还是第一批留学格林尼治的6人之一），也能从晚清一直服役到民国，晋阶海军少将，病死在任内。李鸿章的温室政策，对海军这一兵种未曾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所肥的不过是军人个人而已。（2014年11月25日《时代周报》刘怡）

◆评 论

让宪法的每一条款落地

这段时间，宪法学者很忙。“忙”，成为许多宪法学者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工作状态，媒体专访鱼贯而入，宣讲论坛应接不暇，宪法学者真的忙了起来。“走向法治是一次伟大的长征”，需要一步一步来，急不得，但也停不得。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此次全会后颇不寻常的现象，甚至是一个指标。

2014年10月，在各种先期预热之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将依法治国作为执政党中央全会专题研讨的主题，并且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这个已经被写入现行宪法近20年的治国理政方略，再次成为执政党向世人宣示新政治、深化改革的主题词。“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句不仅被宪法学者频繁引用的会议通报表述，从国民到官员，也都应该并不陌生。

一定程度上，宪法学一直都不算是什么显学，由于《宪法》本身长期停滞于文本性的角色，宪法学者与宪法一样，都难免偏居一隅，与最直接的社会生活有些距离。近来可能更是如此，据统计，2013年中国宪法学在“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一共仅发表了67篇文章，占总量的4.94%，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这三大权威期刊，宪法论文的总发表量更是只有五篇，仅占总量的2.8%。宪法学的学科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见一斑，甚至不乏宪法学者研究领域发生转向——转而研究更细节、更技术性的问题。

显然，这不仅是作为一门普通法学学科的现实处境，它还与《宪法》本身在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有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句话为公众所熟悉，但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所言，宪法的实践性功能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主要被当作政权合法性的认定书，它是“镇国之法宝”，但却没有实践操作的空间与设计。让宪法从“镇国之法宝”逐步转向“治国之法典”，这不能仅是一群宪法学者的经年呓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所讲的“宪法监督制度和解释程序”需要有真正意义的推进与实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无论法治，还是作为法治核心的宪法治理，民众何以信仰，这都要求《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条款，能有逐项逐条的真切落实，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机制在制度层面得以激活。依法执政首先就是依宪执政，从国企银行，到机关社群，对于学者进行宪法宣讲的热衷，不仅是对新政策新思路的知情需求，更应是对宪法所标明的公民权利本身的认知觉醒。

于学者而言，除了奔走于各个场合的宣讲解读，还有在立法层面激活宪法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上恪尽本分；于权力者而言，除了对宪法文本、依宪治国思想的学习、体会，更应有每一次权力行使的审慎谦卑，谨守“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底线；于公民而言，对宪法的信仰与遵奉，就在身边的每一天生活，每一次对自身权利的珍惜与捍卫——现在，更是宪在。

宪法学者很忙，《宪法》更应该、也有理由和机会忙起来。让每一项宪法权利都能真的落地，从文本走向实践，《宪法》必须用起来、活起来。（2014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社论）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